

# 戰時日常性：戰場以外的 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

● 方德萬 (Hans van de Ven)

直至1990年代為止，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中國的意義，人們一致的看法是：以事件來說慘絕人寰，但就歷史意義而言不大重要。真正促成變化的因素是在中國農村爆發的革命。國民黨受到嚴厲批評：他們對於打敗日本無甚貢獻；國軍消極避戰以囤積盟軍供應的物資，留待日後對付共產黨；國民政府是無能而獨裁的政權<sup>①</sup>。

現在情況已經轉變。大多數歷史學家，包括中國歷史學家，都同意抗日的主力是國軍部隊，而共產黨則躲藏在中國西北山區，靜待戰爭結束。他們一致認為，考慮到當時中國經濟發展的情況，國民政府保衛國家的效率之高令人驚訝。國民黨領導一個農村社會抵抗一支工業化的現代軍隊，獨力苦撐了四年，而當時在亞洲的西方列強——英國、美國、法國和荷蘭等，眼睜睜看着亞洲被戰火燃燒而袖手旁觀<sup>②</sup>。國民政府採取以消耗日

本為目的的防守策略，這並非表示無能，而是唯一的理性作戰方法<sup>③</sup>。歷史學家現在認為，二戰期間中國有亡國和文化滅絕之虞，而當時發生的變化有着長遠影響。鮮有論者仍然認為這場戰爭在歷史上無足輕重。

這種新學術研究取向的好處是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這場戰爭的進程。若想掌握中國在二戰中的情況，可參閱現有豐富的中英文二手文獻<sup>④</sup>，當然，仍有一些空白待補之處。華北戰場仍有待嚴肅的研究。儘管戰爭最後兩年有決定大局的作用，但論述這個時期的文獻卻寥寥可數。1944年，日本在中國發動它在二戰中最大的陸上軍事行動——「一號作戰」，摧毀了國軍的剩餘力量，遍布華北的共產黨人迅速和巧妙地利用這個機會。國民黨的國內和國際聲望因一號作戰受損，一直無法彌補。縱然關於這場戰爭的研究仍有闕漏，但其基本歷史輪廓現已釐清。

\* 本文原刊於 Hans van de Ven, "Wartime Everydayness: Beyond the Battlefield in China's Second World War",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3, no. 1 (2019): 1-23。

雖然有這些進展，但我們對於戰場以外的情況仍然所知甚少。南京大屠殺、731部隊的細菌戰實驗和慰安婦十分為人熟悉，甚至在學術圈外也是眾所周知<sup>⑤</sup>。這些都是駭人聽聞的可怕事件，但這場戰爭還有另外一些較為平淡但同樣影響廣泛的後果。八年抗戰期間，數百萬士兵在全國各地戰鬥，數以千萬計的難民背井離鄉，稻米、小麥、油和鹽等對生存不可或缺的商品，供應一再中斷；商店結業、銀行倒閉、市場關門；寺廟、教堂、學校和大學被佔據、改作他用、遭劫掠或摧毀。政府在動員社會時，權宜採用新的行政架構，試行新的政府運作方式，並要求人民犧牲奉獻。我的研究興趣是這場戰爭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日常影響。

我認為注意這些層面有三個好處。第一，我們可以用另一種思維方式來看待這場戰爭，而非只視之為一連串戰鬥和暴行。教科書、學術研究和傳媒不斷提及戰鬥和暴行，即使不算陳詞濫調，也把它們變成了歷史的固定套路，甚至往往以此來支撐現有的權力層級。抗日戰爭依循着傳統軍事史的書寫模式——這是蔣介石與毛澤東之間、重慶與延安之間的戰爭，是發生在上海與武漢的戰鬥，是重慶大轟炸，是同盟國的關係。我們很少聽聞中國農村複雜多變的情況，對於那些有茶館、戲院、學校、寺廟、教堂和清真寺的中小型城鎮，我們對其處境也所知甚少，而這場戰爭對於這些層面的社會影響十分深遠。

第二，在戰場以外，這場戰爭對於大眾態度、公眾情緒、街談巷議的影響，對我們理解這一場巨大災劫的過程十分重要。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早在拿破崙戰爭後就

指出，戰爭中有三個決定大局的因素。首先是理性計算，亦即指揮官和政治家為達成目標，在制訂計劃和策略時所做的決策；其次是機會，亦即在兩軍相遇時所有不可預見的事件，即所謂戰爭的迷霧(the fog of war)；最後是士氣，不只是軍隊的士氣，還有廣大民眾的士氣。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志願軍因其革命熱情而打敗了訓練更精良的普魯士軍。我希望藉着調查中國戰時的日常生活，能令我們更透徹認識抗戰的上述最後一個因素，亦即在複雜的社會、地區和世代情況中的公眾情緒。一個四分五裂的中國，軍事力量薄弱、缺乏工業基礎，政府不理民生、庸碌無能，卻與強大的日軍周旋了八年。我們無法解釋這一點，除非能更深入了解一般人對這場戰爭的態度。

第三，把關注目光投放到軍事和政治領袖以外，為調查尋常百姓對於暴力時代的切身感受提供了機會。近年有大量日記和回憶錄出版，揭示了個人對於這場戰爭的看法。在這些出版物中，個人不是被戰爭慘劇蹂躪、面目模糊的受害者，而是一個個有感受、情緒和想像力的人，牽繫於各種情感之網中，而且有複雜的社交網絡，並積極參與其中。這讓我們透徹看到人們以獨闢蹊徑的方式應對戰爭、戰爭對於家庭和世代關係的影響，還有饒富深意的沉默和禁忌，這些對於支持飽受壓力的社會群體來說十分重要<sup>⑥</sup>。關於日常性的這些層面的調查只是剛剛起步。寫作這些題目的好處之一，是其結果呼應了戰後新一代人的關注，較少關注著名將領、重要政治人物和大戰役，而是着重於身份和記憶。

我希望用「戰時日常性」(wartime everydayness) 這個簡潔說法來概括上

述所勾勒的種種問題。這個詞考慮到一個事實：無論戰爭造成的混亂有多嚴重，破壞有多慘烈，動盪有多創痛，中國人都能發展出新的常態——至少是戰爭期間的常態。這個詞令人注意平凡、家庭、親密和群體性質的事物，它借用了德國所發展的「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 概念。雖然在調查中國戰時日常性時，由於明顯原因，我們不必關注納粹遺留的影響，也不用特意去尋找那些貧窮和無權無勢之人的反抗行為，為他們平反正名，這些是日常生活史常常要措意的事項<sup>⑦</sup>。反之，我希望這個詞能提供一些沒那麼政治化的方式來談論這場戰爭，令戰時罪行、合謀、勾結和反抗退到較次要的位置，而讓我們普遍共同的人性 (common humanity) 佔據顯要地位。

本文首先描述這場戰爭對經濟的影響，接着討論兩名中國精英的閱讀生活。對其中一人來說，主要結果是對國民黨的現代性不再抱有幻想；而對另一人來說，則是變得深信於藝術、文學、教學和家庭撫平創傷的作用。最後，探索通史書這種新的史學類型在戰爭時代大為流行的現象。戰時的中國大學生，不管主修甚麼科目都必須修讀通史課，我們從當時一些著名史家撰寫的通史著作可知，在國難當頭、大學生常常顛沛流離於異地之際，這些史家是如何向年輕學子呈現中國歷史的。

## 一 經濟層面

以下有兩個例子十分適合於展示我所指的戰時日常性，一個引自一本戰時日記，另一個則引自一本近年出

版的回憶錄。回憶錄由齊邦媛所撰，她的父親是著名的東北流亡者，她本人在戰爭期間成長<sup>⑧</sup>。1937年12月國民政府首都南京被日軍攻佔後，齊邦媛逃出南京，首先到戰時中國的陪都重慶上中學，之後考入武漢大學，這所大學在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後西遷四川樂山。至於那本戰時日記則是國民政府行政院的官員陳克文所寫<sup>⑨</sup>。陳克文出身於中國南部廣西的貧窮自耕農家庭。他能夠出人頭地得益於民國時期現代西式學校的普及，先是入讀廣西省內的中學，之後考入廣東高等師範學校。陳克文受五四運動所鼓舞，加入了國民黨，相信它能改變中國，使之成為現代國家。國民黨第二號人物汪精衛在1938年致力向日本人求和，成為蔣介石的死對頭，最後身敗名裂。陳克文原是汪精衛的親信，從來不是很有權勢之人。汪精衛離開後，陳克文留在重慶，國民黨把他留在行政院供職，大概是為了顯示蔣介石寬大對待汪精衛的追隨者，而沒有對其加以整肅。

在齊邦媛那本文筆優美的回憶錄中，她憶述了從南京前往重慶那一年造次顛沛、險阻重重的旅程，描述她如何學會欣賞中國鄉間之美，並與老師談詩論藝。她既崇拜老師的學問，也敬佩他們對於學生的熱誠。齊邦媛戰後返回中國沿海。她抵達上海後，無法適應當地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她穿着沒有腰身的藍布旗袍，腳上是「車胎底圓頭皮鞋」，一身很「土」的「重慶衣裳」<sup>⑩</sup>。這種服裝令她朋友的妹妹覺得與她走在一起很難堪，於是帶她去買衣裳。她穿上比較配合上海時髦風格的服裝後，在服裝店的鏡子中「看到的，真是一個我所不知道的自已」<sup>⑪</sup>。

1937年11月，日本在淞滬會戰中得勝，接着向南京進軍。國民政府用船隻把官員撤往武漢，陳克文是疏散人員之一。眼見同僚在船上唱通俗歌曲、挾妓跳舞，性格拘謹刻板的他深感不悅。陳克文在戰前常以素麪為早點，在武漢第一次吃油條和燒餅，兩者都是中國北方受歡迎的早點<sup>⑫</sup>。他對於自己喜歡這些食物感到驚訝，並認為吃這些食物是愛國的表現。他在日記中說：「基督將軍馮玉祥〔被視為愛國者〕提倡食燒餅，謂勝於外國麪包，此語不虛。」<sup>⑬</sup>和陳克文一樣，戰時數以千萬的難民不得不改變飲食習慣。在一個以地方菜系為重要文化標記的國家，這可是很重要的事。

消費模式的變化反映了這場戰爭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國民政府的一個關注重點，是保證糧食、衣服和鹽等生活必需品供應無虞。日本佔領了國民政府的腹地，令他們失去主要收入來源，包括海上貿易的稅收、鹽稅和向工業產品徵收的統一稅。他們也無法接觸國際市場，包括大米的來源地，因為廣東、福建和浙江等沿海省份是進口大米的地區。那時中國軍隊已膨脹到三百多萬人，國民政府還要面對向大軍供應物資的重擔。

在1941年之前，國民政府極為有效率地應對這一挑戰。他們採取一種簡單的權宜之計，那就是撤往雖然貧窮但農業生產水平較高的地區，包括安徽、河南、江西、湖南，以及四川這個中國西部的「米倉」。國民政府得益於1938和1939年風調雨順的天氣，但同樣重要的是他們致力開墾農地，把難民安置到空置或荒廢的土地，引進多種新的作物，發展灌溉系統，並推廣馬鈴薯、小麥和花生等高熱量作物<sup>⑭</sup>。國民政府實行的政策，

是把戰爭財政的負擔分攤到城市人口和未來世代（依靠印發鈔票）身上，而非農村。台灣歷史學家侯坤宏指出，這些政策直至1941年為止都還算成功<sup>⑮</sup>。其後爆發的太平洋戰爭，把中國與國際市場的聯繫全部切斷，產糧大省又被日本人佔領，而通貨膨脹更令情況惡化。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是一個轉捩點，如一份英國情報報告指出：「以往運抵上海的貨物，以迂迴方式運到中國自由地區，現在這些物資供應即將斷絕。」<sup>⑯</sup>

國民政府經濟部在1942年出版了一份報告，從中可見在抗戰這一階段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之嚴重。該報告調查了煤、棉花和食用油，以及紙、蠟燭和肥皂等較次要物品的供應。棉花除了用來做衣服，還用來做被褥，短缺問題十分嚴重。棉花的主要生產地是陝西和河南，這份報告估計棉花產量只夠生產人均1.8米的棉布，相當於實際需求的三分之一。棉花的需求量在當時還能保持彈性，但已到了不能再拖延的地步，人們不可以一直不購買新的衣服。國民政府曾考慮推行棉花專賣，但最後沒有實行，因為人們認為政府機構沒有能力完全控制棉花收成和紡織品市場，擔心嘗試實行專賣會造成黑市和出現謀取暴利的情況。反之，經濟部向軍隊和政府人員實行供給制<sup>⑰</sup>。這是齊邦媛的「重慶衣裳」背後複雜的現實情況。

1942年的報告也指出，作為工業生產和鐵路運輸燃料的煤產量足夠，但由於運輸困難，令四川的煤數量不足，而國民政府把工業生產基地遷到常遭日軍轟炸的四川。該報告認為政府向家庭用戶應只供應較為劣質的煤；而企業應向經濟部通報用煤需求，政府則以國家規定的價格向它們

供應煤。烹飪用的油對於中國飲食是不可或缺的，因為中國沒有酪農業，所以不能生產牛油。經濟部的報告指出，其產量比最低需求少一成，遂建議一些措施增加油料作物的種植，並要求政府收購一半產量以供應城市中心和壓抑通脹<sup>⑩</sup>。

對於人類飲食不可或缺的鹽，情況同樣可慮。戰前中國所需的鹽八成依賴海鹽，沿海產鹽地區被日本佔領後，湧入了數千萬難民的中國大後方就主要依賴四川和雲南開採的岩鹽來供應當地人口的需要。1941年，鹽產量從2,130萬公斤跌至950萬公斤，到1945年再跌至660萬公斤。產量波動很大，有些年份則顯示顯著的上升情況，如1940和1943年。然而，即使國民政府花了很大功夫去維持生產，包括引進新的開採技術，並組織收購和配銷網絡，總體情況仍然十分惡劣<sup>⑪</sup>。

上述過程可以概括為經濟的去現代化。歷史學家兼外交家蔣廷黻在1940年春天返回家鄉湖南，在途中注意到農村家庭搬出紡車，清洗乾淨後開始用手紡線，而點燈用的煤油則被桐油取代<sup>⑫</sup>。旅館沿着傳統貿易路線重新開業。經濟去現代化並非一無是處：許多過去因中國沿海工業化而失業的人，現在其勞力再度被需求。據蔣廷黻說，苦力再次找到工作，他們的工資提高了，議價能力也有所上升。許多充滿幹勁和創業精神的人，原本前往沿海城鎮去工作、寫作、學習或遊玩，現在帶着財富、技術和人脈回到農村的家鄉。

這場戰爭也改變了中國的貿易模式，因為進口戰爭物資成為首要之事。中國缺乏具規模的軍事工業。戰爭爆發前，中國主要進口的貨物是紡

織品、煤油、火柴、香煙和輕工業產品。截至1941年10月，蘇聯向中國提供了1,500架飛機、160輛坦克、1,800門大炮、1,300架車輛和10萬枝步槍<sup>⑬</sup>。1941年4月蘇聯和日本簽訂中立條約，停止向中國出口物資，而美國則取而代之。美國的租借法案為中國提供武器、彈藥、煤油、工業機器、鈔票和其他物品，大部分在戰爭的最後一年運到。

由於進入中國的供應路線曲折漫長，故沿途設立了眾多物資存放站。1943年後發生了一連串事件，包括盟軍的全球軍事策略和反攻緬甸的安排，令同盟國尤其是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惡化，批評國民黨的人以這些物資存放站來控訴國民黨囤積居奇，指摘他們腐敗無能和無愛國心<sup>⑭</sup>。囤積物資成為一些人抹黑國民黨的簡單象徵，並藉此掩飾英美兩國以歐洲戰場為重的決定。貿易從來不僅僅是關乎物質的過程，而是帶有重大的象徵包袱。

戰時貿易助長了數字化管理技術的採用。二戰促成了這種思維和行為方式在世界各地興起，官僚機構制訂和緊盯着登記冊、表格、統計資料、圖表和數字，以確保數量合乎所需的部隊在正確時間到達指定地點，並獲得適當的設備和糧食，以執行特定的軍事任務。1932年，國民黨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研究中國經濟、文化、社會、政治狀況，並制訂計劃，建立應付現代戰爭所需的工業、礦業、鐵路、機場和官僚組織，戰爭期間由資源委員會取而代之。兩者的檔案裏都有長長的清單、詳細的計劃文件，以及同樣鉅細無遺的季度、半年度和年度報告。從中可見，政府控制的程度常常無法達到現實需求。

如果說那種不無問題的數字化管理技術的擴散，是現代管治方式的高層次後果，那麼國民政府在戰時安置難民的計劃，就代表了一種更為務實的結果。穆盛博 (Micah Muscolino) 檢視了國民政府如何利用在黃河決堤後，為躲避洪水逃到陝西省黃龍山地區的難民墾荒。國民政府的主要目標是提高糧食產量，但同時把約五萬名逃到黃龍山的無家可歸者組織起來，向他們灌輸民族主義，消除國民政府視為落後的宗教習俗，並開墾這個在晚清叛亂後成為荒土的地區，以便與日本人和共產黨對抗<sup>23</sup>。有趣的是，這種措施，包括國民政府推行的灌溉水利計劃，令這個地區在1950年代末共產黨推行大躍進政策造成災難時，能夠逃過一劫<sup>24</sup>。

## 二 閱讀世界：陳克文與齊邦媛

如果說抗戰期間中國在經濟方面出現去現代化的情況，那麼文化圈卻並非如此。陳克文是愛讀書之人，閱讀興趣廣泛，包羅世界各地的作品。他在戰時所讀的書籍和劇本包括巴金的《死去的太陽》(1931)；高爾基 (Maxim Gorky) 的《避暑客》(Summerfolk, 1904)、《童年》(My Childhood, 1914) 和《我的旅伴》(My Travelling Companion, 1893-94)；老舍的多部作品，包括《離婚》(1943)；拉斯基 (Harold J. Laski) 的《美國總統制》(The American Presidency, 1940)；林語堂的《愛與刺》(1941)；威爾斯 (H. G. Wells) 的《未來的面貌》(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1933)；威爾基 (Wendell Willkie) 的《天下一家》

(One World, 1943)；張君勱的《立國之道》(1938)；曹禺的《日出》(1936) 和《北京人》(1940)；馮友蘭的《新理學》(1939)；夏衍翻譯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的《復活》(Resurrection, 1899)；金斯 (James Jeans) 的《科學新背景》(The New Background of Science, 1933)；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1931)；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的《人類的由來》(The Descent of Man, 1871) 的縮節本；雷馬克 (Erich M. Remarque) 的《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1927) 和左拉 (Émile Zola) 的《小酒店》(L'Assommoir, 1877)。陳克文也喜歡為其兒子陳方正說故事，尤其愛講述《三國》和《水滸》等中國傳統小說<sup>25</sup>。

陳克文特別推崇歷史學家赫恩肖 (F. J. C. Hearnshaw) 和小說家威爾斯。他在1930年把赫恩肖的《歐洲政治思想小史》(An Outline Sketch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翻譯成中文於香港出版。此書認為真正創造歐洲歷史的人，是有理性思維的自由主義精英，他們領導貧窮、無知和受剝削的群眾推翻貴族和宗教特權<sup>26</sup>。威爾斯的《未來的面貌》以小說方式提出同樣論點。作為一本未來的歷史書，該書被描述為一本2106年出版的歷史教科書，記載從1933至2106年的世界史。故事述說民族主義、經濟困境、宗教，以及幾乎令人類滅絕的戰爭。一個由航空管制員組成的政府取消了民族國家、將宗教列為非法，並培養優秀公民，從而拯救了世界。陳克文喜歡赫恩肖和威爾斯一點都不令人驚訝。他大量吸收新文化運動理性主義的源泉，包括對中國傳統的批評、對「賽先生」和「德先生」的頌揚，

以及對知識精英的重視<sup>27</sup>。身為政府官員，他認為自己有責任促進現代自由主義在中國實現。

然而這場戰爭令陳克文感到理想破滅。他在南京時對中國前途十分樂觀，對中國的進步甚感讚歎，他從市內寬廣的大道、電燈、簇新的辦公大樓和到處拔地而起的現代住宅看到這種進步。戰爭開始後，令他感到失望的事情接踵而至。陳克文在1937年12月得悉湖南、河北兩省的工作報告大多是子虛烏有，大為震怒<sup>28</sup>。如前所述，在成千上萬人死於戰場、難民倉皇避禍之際，他把政府官員由南京運送到武漢時，在船上目睹同僚在跳舞，大唱《妹妹我愛你》，深感痛心<sup>29</sup>。省政府官員放棄職守逃走，置市民於不顧，令他為之扼腕<sup>30</sup>。財政部長孔祥熙因為貪污而一再受他批評。陳克文以贊同的態度引述一位財政部同僚的話：「只要孔氏一家，便足亡國而有餘。」<sup>31</sup>1944年，同情共產黨的英國記者格爾德(Stuart Gelder)指摘「中國在下者營私舞弊，在上者懦弱無能」，陳克文對此甚有同感<sup>32</sup>，並說：「其實中國弱點早已如此，必待友邦人士之指摘，始知改正，亦已遲矣。」<sup>33</sup>陳克文出於責任感繼續留在國民黨，不過在國共內戰結束後，他覺得應告一段落了。他不願到台灣參與國民黨的工作，在香港教學和寫作度過餘生。

齊邦媛對於戰爭的反應截然相反。她閱讀中國、俄國、法國和英國文學，從而把自己所經歷的苦難與其他人相對比較，並發現不一樣的、給人以希望的現實。文學啟發她尊重文化和美，並令她相信人的正直、溫柔和悲憫之心。她從文學中知道，歷史上有過一些亂世，但全都結束，而沒有摧毀人類中美善的事物。

齊邦媛在重慶的沙坪壩入讀南開中學，深受國文老師孟志蓀的薰陶。孟老師帶領她學習《詩經》、《楚辭》、《古詩十九首》、唐詩、著名散文寫作和現代文學。孟老師要求學生背誦許多詩詞，「日日夜夜背誦詩詞。今日靜靜回首，中國文學史中重要佳作我多已在那兩年背了下來」<sup>34</sup>。一如許多聰敏而性格沉靜的年輕學子，齊邦媛利用假期閱讀，包括中國著名小說《紅樓夢》，何其芳和卞之琳的現代詩，高爾基、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的俄國文學，還有紀德(André Gide)的《田園交響曲》(*La Symphonie pastorale*)。

齊邦媛離開南開中學後，考入武漢大學，該校遷至重慶以東250公里的樂山，遠離日本人的空襲威脅，選址甚好。樂山鄰近神聖的峨眉山，中國詩聖杜甫在八世紀遭遇類似的亂世時，曾在當地避禍和偷閒作詩。齊邦媛不理會父親的建議，選擇哲學為主修科，但教務長朱光潛說服她轉到外文系。朱光潛是著名的學者，曾在北京大學教書，並編輯《文學雜誌》。他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談美〉是民國時期高中學生必讀之作。齊邦媛認為有機會跟隨他學習實在求之不得<sup>35</sup>。

朱光潛選用《英詩金庫》(*The Golden Treasury of English Songs and Lyrics*)為教科書，這本書到二戰時已在全世界發行了五十萬冊，英國浪漫時期的詩在該書中佔有重要地位。這些作品哀怨、感人、意象豐富，但也淺白易明，觸及了大部分學生面對的生離死別和震駭經歷。齊邦媛從南京前往重慶的旅程中，一個妹妹死了，母親也差點喪命，沿途不斷受到日本飛機襲擊的威脅。在一次日軍空襲中，一顆炸彈掉到齊家附近，屋頂

被震落一半，下雨時她父親要撐着一把大油傘為她生病在牀的母親擋雨。齊邦媛也時常擔心張大飛的安危，他是孤苦無依的東北孤兒，與齊家關係密切，後來當上中國空軍的飛行員，齊邦媛與他互有愛慕之情。

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的《露西組詩》(*The Lucy Poems*)令齊邦媛為之着迷：「平實簡樸的深情至今少有人能超越。」<sup>36</sup>詩人在這組詩的第三首《我在陌生人中旅行》(*I Travelled among Unknown Men*)中說，他再也不離開英國了，因為英國的綠野是露西最後看到的。「這對當時愛國高於一切的我，是最美最有力的愛國情詩了。」<sup>37</sup>朱光潛也要齊邦媛讀雪萊(Percy B. Shelley)的《奧茲曼迪亞斯》(*Ozymandias*)，這首十四行詩既講帝國衰亡，也關於風光不再的文壇名聲。朱光潛唸詩通常都語氣平和，但這次「〔教授《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時〕他用手大力地揮拂、橫掃……口中念着詩句，教我們用“the mind's eye”……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西方詩中的意象，一生受用不盡」。當她讀到雪萊的《印度小夜曲》(*The Indian Serenade*)中，詩人情緒激昂不能自己而倒在地上，喊出“I die! I faint! I fall!”(我死了！我昏了！我敗了！)齊邦媛覺得它表達了「我喊不出來的鬱悶」<sup>38</sup>。齊邦媛在戰時閱讀的文字，為她開啟了一個世界，這個世界的中心是人際關係、情感、學習、悲天憫人的價值觀，以及美，而非戰爭、革命和暴力。這個世界賦予她表達自己情感的字詞、比喻和象徵，並令她發現之前不大注意或從未察覺的情感。

齊邦媛的回憶錄有一個主題貫穿於其中，那就是她所置身的學問與文

學的世界與飛行員張大飛所處的戰場的對比。當中的要旨是：中國不但派了部分青年到戰場對抗日本人，也確保另一批青年能接受教育，使中國的文化和文明傳統得以綿延賡續。毫不奇怪，這正是齊邦媛在往後人生所做的事。

我把齊邦媛和陳克文的閱讀世界加以鋪陳，並非認為他們的經歷很有代表性，而是想藉着這方面的探討，闡明回憶錄和日記可以向我們揭示思想和感情的世界，這是來自檔案館的文件所無法言說的。他們的例子說明，挖掘這些資源能讓我們一窺這兩位在中國普羅大眾之中善於表達自己所思所想的人物，在抗戰期間迥然不同的經歷和反應。不說別的，它們顯示了在中國決心抵抗日本人的意志中，除了單純的民族主義，還有許多其他元素。

### 三 「紛擾的時代」： 文明感性

歷史學家的工作絕不容易，而在二戰期間，中國歷史學家的閱讀、寫作和教學尤其艱苦卓絕。許多人(儘管絕非全部)加入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和科學家的行列，大舉離開中國沿海城市。他們原本在建立於晚清和民國早期的北大、清華、復旦、南開等沿海城市的著名學府中擔當要職，當炸彈如雨般落到他們頭上而被迫背井離鄉時，定必為前路感到徬徨。

令這件工作變得更複雜的是，如果說日本正把中國人從中國沿海地區趕走，那麼中國歷史學家在辛亥革命後就已把中國的史學棟宇燒成灰燼。早在晚清時期，革新派學者著書撰

文，這些書文論證嚴謹又令人震撼，認為歷代王朝支持的儒家傳世典籍是偽作，藉此挑戰清室統治的法統。他們仍然堅信儒家黃金時代的存在，這可以通過真正經典的小心訓詁考據來找尋，從中窮究出一些經驗教訓，以求得治世經國和安身樂業之正道。1920年代，「疑古派」全盤否定夏、商兩代及以前的古史時期。另一學派史家則受美國新史學派影響，要求以嚴謹的理性邏輯來重建中國歷史，這並非為了恢復人們對其價值的信心，而是將中國從歷史黏乎乎的觸手中解放出來<sup>⑳</sup>。這是以歷史為腐蝕劑，用來清除中國文化的傳統鏽迹，但此外別無價值<sup>㉑</sup>。

不過，當時也有一些好消息。1929至1937年間，中國考古學家在河南省安陽縣殷墟進行發掘，挖出銅器、墓穴、陶器、建築基址和甲骨，顯示商朝(公元前1766至1122年)真的存在。過去學者一直懷疑傳統文獻是向壁虛構，而考古學家證明了這些歷史記載是可靠的<sup>㉒</sup>。他們的發現為中國上溯了逾五百年的歷史，賦予中國文明古國的地位。這或令中國人重拾自豪感，但基本問題卻仍然存在。歷經幾十年的疑古思潮、一個世紀敗於西方列強的屈辱，以及日本佔領中國腹地，中國歷史有否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抑或它僅應陳列於博物館？

這場戰爭為史學注入新生命。儘管不是全部，但許多著名歷史學家都不願留在淪陷區。他們任教於流亡大學，如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由南開、北大和清華三所大學組成，這些學者在流亡大學中講課和寫書撰文。當時所有大學生不論主修甚麼科目，都必須修讀中國歷史課程，所以上通史課的人很多。這為通史書

創造了需求，在戰爭頭六年有至少二十本面世<sup>㉓</sup>。

雷海宗、錢穆、范文瀾三位著名作者，寫了三本迥然不同的通史教科書，都是學術性的歷史著作，源自扎實的歷史研究和深入的文獻閱讀。但三人之所以撰寫這些書，也是為了給予讀者堅持抵抗日本人的理由，並藉此激勵他們相信前途會更美好。儘管在一些回憶錄中可以找到一鱗半爪的記載，但我們無法知道學生對於他們的講學有何反應。不過，我們可以想像這些背井離鄉的學生，坐在擁擠不堪的校園簡陋的教室中，聽着名重一時的教師授課，嘗試適應自己身處的新境況，並為自己和中國面臨的問題尋找答案。

雷海宗擁有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講師。他的學生何炳棣是戰後中國的重要歷史學家，據他憶述，雷海宗不用看筆記就能侃侃而談西方和中國歷史，聽得他興奮莫名<sup>㉔</sup>。雷海宗借用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和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著名的文明方法來拯救中國史學，擺脫西方中心的歷史書寫原則，令它恢復自主和活力。斯賓格勒和湯因比堅持，歷史的適當的主體應是文明而非國家。對湯因比來說，某個文明的命運取決於其精英是否有能力提出有創意的解決辦法，以應對外來的挑戰。他把自己所處的時代稱為「紛擾的時代」(Time of Troubles)：工業革命和全球化令歐洲文化佔據支配地位，但歐洲文明正在衰落，因為西方精英無法為他們所身處之時代的問題提供答案，包括歐洲國內民眾不滿和其他地方的反殖民運動<sup>㉕</sup>。

時至今日，湯因比大體上已為人遺忘。很少歷史學家仍然依循他那種

對於文明的大格局式理解。他後期寫作中的宗教意涵，以及他相信史學有其道德作用，都與我們的後現代思想扞格不入。許多人（儘管絕非全部）不認為文明的概念有助於歷史研究<sup>⑤</sup>，然而，湯因比在1930和1940年代是烜赫一時的歷史學家，尤其是在出版了首三卷《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之後。蔣廷黻曾在倫敦與他會面，並為之而自豪，稱湯因比為「阿克吞第二」，「阿克吞」即是以「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這句名言而聞名的史學大家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蔣廷黻認為，「他的智慧實在是英國和二十世紀的一項光榮」<sup>⑥</sup>。湯因比的著作否定歐洲的獨特性，並堅稱沒有一種文明是停滯不前的，對雷海宗這些歷史學家來說，這猶如醍醐灌頂。他們以此讓中國歷史擺脫停滯和落後的指摘，並為當時所處的中國賦予意義。

雷海宗1940年的著作《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十分有名，書中收錄了五篇戰前所撰和兩篇之後寫下的文章。這些文章大氣淋漓，言簡意賅，不尚文字虛飾和來自「斷簡殘編」的考據註釋<sup>⑦</sup>。雷海宗在戰前把中國文化分成兩個周期（周）。在第一周中，純粹的「華夏」民族創造的文化在黃河流域興起、成熟並繼而衰亡，這一週延續至公元四世紀。公元三世紀北方胡族的入侵幾乎斷絕了中國文明，但漢族軍隊在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戰打敗北方胡族，阻止了他們奪取黃河下游地帶和中國南方。這場勝利為中華文明的第二周鋪平了道路，這一週的發展有賴於南方精英的生氣活力，並受印度佛教影響而演變。由於他們沒有被完全打敗，第二周文化的中國人可以聲稱自己上承第一週<sup>⑧</sup>。

在1937年前，雷海宗對中國的前途感到很悲觀。中國無力抵抗滿洲人和西方帝國主義，科舉制度造成不求甚解的學習方式，士大夫沉溺於訓詁考據等鉅釘之學，不深究義理思想，並且鄙視軍事，這些全是衰敗之兆。但抗日戰爭爆發令雷海宗有所改觀。〈建國——在望的第三周文化〉是《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最後兩篇文章之一，雷海宗在該文認為中國抗戰到底而不降日本，顯示了中國的堅強生機。他覺得中國可能正處於前所未有的第三周文化的起點，呼籲同胞把握這個「何等難得的機會！何等偉大的權利」<sup>⑨</sup>。

雷海宗是否真誠相信他所說的話，仍有商榷餘地。他和歷史學家林同濟和陳銓都是《戰國策》雜誌的推動者之一。該雜誌提倡在強大的中央領導下，在中國全體社會創造尚武崇力的文化，從而在「角於力」的戰爭時代中帶領中國。戰國策派認為武力是一切，正義或美德在當代中國沒有多大意義。這份雜誌引發巨大爭論。共產黨期刊《群眾》三年來猛烈批評戰國策派，包括指摘他們崇尚法西斯主義<sup>⑩</sup>。當代公共知識份子兼中國思想史家許紀霖曾為這群人辯護。他認為林同濟的內心歸根結柢是道家，但他認為相較於歐洲人，中國人缺乏一種民族國家至上的奉獻精神。據許紀霖所說，林同濟撰文著述是為了激發這種精神的出現，而非顯示他內心的終極信念<sup>⑪</sup>。

一如雷海宗，錢穆撰寫通史書的目的，是要為同胞提供更佳理由去抵抗日本人。像錢穆這樣的學者是絕無僅有的。不同於大多數民國時期的其他著名史家，錢穆沒有上過大學，也不曾長期身處國外。他以傳統方式獲

得學問，先是在家學習，之後入讀私塾。他最初的職業是在地方上當一名教師，後來因發表了一篇發前人所未發的著作，取得北京燕京大學教席。錢穆認為，對於過去既須存疑，也要有同情的了解。他常被歸類為傳統新儒家，但這樣的歸類有欠公允。他同意為應對中國面臨的現代性挑戰，需要進行根本革新，但革新必須知舊，必須建立在透徹了解中國歷史之上，並且能與中國傳統一脈相通<sup>②</sup>。

錢穆在1940年6月出版著名的《國史大綱》。此書發展自1933年起他在北大講授的中國通史課講義。錢穆在倉促間寫就本書，他心恐自己是亡國之前最後一個書寫中國歷史的中國人。為免自己和筆記因轟炸而受損，他跑到一間山中佛寺閉關寫書，每逢周四、周五和周六則下山到西南聯大授課<sup>③</sup>。

錢穆最喜歡以宏觀而明顯的方式把歐洲和中國歷史並置。他有句名言：「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sup>④</sup>錢穆認為歐洲文明常在驚心動魄之震盪中大步邁進，中國則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在和平中進展。蘇格拉底死於一杯毒藥，耶穌死於十字架，孔子則壽終正寢。羅馬帝國是中央集權和軍事化的征服帝國，羅馬帝國崩潰後，歐洲分崩離析，進入黑暗時代，直至新的中央集權國家出現才得以復原。中國則不同。秦朝統一中國後不久，已不是靠武力來貫徹其統治，改變是從下而上，而非從上而下，中國還在和平的進程中將四鄰的文化和經濟加以融和同化。

錢穆與雷海宗看法相同，認為把來自歐洲經驗的分期法套用於中國歷史是削足適履。他駁斥把歷史視為由專制而躋民主，由封建主義演變為資

本主義的故事。這種故事線並不符合中國的現實，中國把權力分散於社會遠早於歐洲，田畝土地很早就可自由買賣，因此一直談不上是封建社會。同樣，宗教只有在佛教盛行的魏晉南北朝（公元220至589年）時期才成為主軸，而這種情況並非常態。

錢穆與雷海宗不同之處，是他不認為中國需要一個強大的政府。中國社會的團結不是靠武力、法律或強大的領袖來支撐，而是靠「情感」來維繫，其生機與活力是來自所有中國人的日常實踐。不同於戰國策派歷史學家，錢穆不認為中國缺乏一種民族國家至上、超越狹隘家庭利益的奉獻精神<sup>⑤</sup>。他相信中國地方社會有基本的生命力和力量，並認為中國的未來乃繫於此，而非強大中央政府的宏大計劃。人類學家費孝通在倫敦經濟學院師從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他在《江村經濟》（*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一書中表達了類似觀點<sup>⑥</sup>。蔣廷黻也持同樣看法。他在客居海外一段時間之後，1940年到農村遊歷，以重新熟悉地方情況。他接觸到許多旨在改進農業、改善公共衛生和增加地方政府效率的地方計劃；還有一個中央政府試圖在全中國推行五年義務教育的計劃，在他看來並不合理。中國士兵食不果腹，又缺乏對抗日本人所需的武器。因此義務教育制度只是一個美夢，當時的中國根本無法負擔<sup>⑦</sup>。

值得注意的是，影響最大的通史書卻非由錢穆、雷海宗或任何其他重慶或昆明的歷史學家所寫，而是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sup>⑧</sup>，這本書的第一冊在1941年於延安出版，第二冊於翌年問世。除了延安以外，該書

首次於1943年在上海出版。錢穆和雷海宗認為中國依循不同於歐洲社會的歷史軌跡發展，這種看法非共產黨所能接受。馬克思主義信條認為所有社會都依循相同的歷史階段發展，即由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最後到達共產主義。在共產主義史學書寫中，由經濟關係決定的階級鬥爭是推動變化的主要動力。共產主義者肯定無法接受錢穆認為中國只會和平時期中進展，以及叛亂在歷史上無所成就的想法。他們需要一種證明革命合理的史觀。

范文瀾帶着多箱書籍到達延安後，毛澤東要求他以其學力才識寫一本共產主義通史。從兩方面來說，選擇范文瀾是精明之舉。第一，他有學術資歷，對中國歷史和文學傳統有深厚知識，在戰前已是成名史家。第二，他不是正統的馬列主義者，而這符合毛澤東的要求。在抗戰頭幾年的一系列小冊子中，毛澤東主張按照中國的情況調整馬列主義。他提出一個主張，中國現在需要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而非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資產階級革命。在共產主義的認知格局中，國民黨代表資產階級。毛澤東認為中國的革命過程必須依循不同的軌跡，因為帝國主義削弱和分化了中國的資產階級：他們不會推翻資本主義。因此，即使中國仍然處於半殖民半封建、而非資本主義階段，共產黨都要領導革命。毫不奇怪，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為毛澤東提供了理據，此書的第一、二冊在1941和1942年出版，最後一冊於1946年問世。

我讓錢穆、雷海宗和范文瀾所寫的中國通史著作交流對話，目的是顯示抗戰時期並非史學荒漠。這些通史

書的競爭較量只是當時眾多的文化爭論之一，讓抗日戰爭成為一個思想上百花齊放、求新求變的時期。1938年，文學史家梁實秋攻擊「抗戰八股」，呼籲寫作與抗戰無關的其他主題而引起轟動，他還說如中國般的弱國應小心，不要妄自尊大。毛澤東抨擊五四新文學形式，堅持文藝須為革命服務，主張中國藝術家應利用傳統中國文化形式，由此激起廣泛的反應。戰國策派的陳銓以一名國民黨特工為主角的話劇，獲國民政府教育部頒發獎項，引起很大迴響<sup>69</sup>。1944年，作家、詩人兼歷史學家郭沫若發表一篇關於明朝滅亡和滿洲人勝利的歷史文章，相當於對國民黨的強烈譴責，並預言共產黨的勝利，在報章上掀起一場風暴，經過幾個月才落幕。為了全面了解戰時日常性，有必要重拾並分析這些戰時的文化戰爭。

范文瀾脫穎而出，是因為共產黨要強加一種正統史觀。不同於錢穆，許多民國時期的著名史家和雷海宗一樣，1949年後都留在中國大陸；而不願追隨官方主流會付出沉重代價。史學的活力不再。此時，疑古派指中國的過去「落後」並有礙於現代化的批評，讓位給視歷史為「封建」的指摘。然而，到了1990年代史學得以重新發展，許多上述早期史家的著作再次出版。他們無法成為一錘定音之人，但他們的工作再次成為史學爭論的一部分。

#### 四 結論

本文勾勒出中國戰時日常性的幾個層面，分別描述了因糧食、棉花、鹽和煤的供應斷絕而導致的經濟去現

代化，強調在戰爭初期，對於那些在戰前被城市化、工業化和商業化所遺棄的人來說，經濟去現代化帶來了一些好處。戰時經濟受到破壞的後果是長期的。中國在戰時實行的配給制度，直到1990年代鄧小平推動經濟改革、提高經濟生產力才告結束。經濟的變化也影響到文化：戰時的服飾風尚不只反映物資匱乏，還塑造了新的身份認同。

我以一本日記、一本回憶錄和三本通史書，勾勒了一位年輕學生和一位壯年官員的閱讀世界，並檢視三個試圖為中國提出新的民族敘述的舉措。我希望以這種方式描繪中國戰時知識界環境的一些層面，包括精英所爭論的概念，以及發生這些爭論的氛圍。中國既沒有英國那種由學者主持、邀得五百多名志願者參與寫日記的「大眾觀察」計劃，也缺乏美國式的民意調查，我們沒有其他更佳手段來評估中國的民意變化，即使需要遠多於我所提供的那兩個例子來發展出更有代表性的圖畫。報刊並非這項工作的理想依歸，因為它們在戰時受到審查，而且全都帶有鮮明的政治立場。

以上只是浮光掠影地談到中國的戰時日常性，我對此十分清楚。我沒有探討宗教，儘管宗教對於戰時日常性的構成顯然十分重要。雖然學愚研究過佛教的愛國動員，包括組織救死扶傷和撫慰喪親者的「僧伽救護隊」，但宗教這個題目還是很少為歷史學家所探究<sup>⑥</sup>。這場戰爭無疑深刻地影響了宗教。當時難民、學生和士兵佔據寺廟、教堂和清真寺，許多宗教建築物遭受毀損；僧侶、神父、牧師、伊瑪目也加入流亡難民之列。宗教組織對於提供慈善賑濟、為死者舉行儀式和協助難民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如學愚所指出的，原本嚴守政教分離原則的

國民黨，在這場戰爭中與宗教領袖、社群和機構有了某種和解修好：他們都互相需要對方。那種修好對後來台灣的宗教生活影響深遠，也影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宗教生活，但1950年代的整肅和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令這種和解終結。宗教這個題目很重要，因為它讓我們深入洞察（即使只是間接地）大量只受過很少教育、不識字的中國人戰時的日常生活<sup>⑦</sup>。

我也幾乎沒有談到這場戰爭對於公共生活的影響。國民黨人加強了崇拜孫中山的國父紀念周活動。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前的1941年11月3日，蔣介石到成吉思汗靈寢主持祭祀，由此把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侵略者變成了抗日英雄，他這樣做是為了與日本人爭奪蒙古族群體的支持。張自忠將軍在1940年5月戰死沙場，國民黨人把他陣亡殉國轉化成盛大的公眾事件，以莊嚴肅穆的儀式將其遺體運到重慶，沿途都是恭送靈柩的軍民。張自忠對於是否參加國民黨的抗戰大業最初有所猶豫，而此時國民政府的軍政顯要都在場迎接這位將軍的靈柩，他的遺體臨時停放於重慶附近一間廟內，待他的家鄉光復後才遷葬<sup>⑧</sup>。岳飛這位中國至高無上的英雄，在地方戲曲、電影、廣播電台、木偶戲、戲劇和報章中取得新的重要地位。巡迴劇團遊走於中國各地，上演《明末遺恨》以激發民眾的抗日情緒，而《木蘭從軍》這部電影則大獲成功<sup>⑨</sup>。如果英勇抗敵是主題，那麼背叛、貪污和懦弱就是從屬情節。戰時廣播是另一個需要探究的題目。國民黨利用這個媒介來播放演說、愛國劇、京劇和話劇，以及發布消息<sup>⑩</sup>。所以，需要探究的題目多不勝數。

我也希望清楚指出，對中國來說，二戰不只關乎打敗日本或者國共

鬥爭那麼簡單。放眼於戰場以外，把目光移離戰時的主要政治和軍事人物和地方，能開啟看待中國二戰的新方式，不是把此時期的中國看成純粹遭日本侵略的受害國或同盟國中備受忽略的一員，而是將二戰視為中國日常生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經歷變化的時期。這就令我們能將中國與歐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區做一些新的比較。如果中國的歷史學家在二戰中找到新聲音，並擺脫那些以現代化和國家締建等韋伯式主題為主軸的西方中心式史學，那麼類似發展也會出現在其他地方。我們必須對二戰有一種放眼全球的了解，才能公允和恰當地看待它的現實。

林立偉 譯

### 註釋

① 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2).

② 米德在其著作中強調這點，參見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 Penguin, 2014)。這本書的美國版本，書名是《被遺忘的盟友》，參見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③ Hans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Routledge, 2003)。

④ 參見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Stephen MacKinnon, *Wuhan, 1938: War, Refugee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Diana Lary,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37-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Hans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Oxford: Casemate, 2013)；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楊奎松：《革命》，第三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一本專刊《抗日戰爭研究》，專門探討這個題目。

⑤ 現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文獻汗牛充棟。張純如備受爭議的經典之作，參見 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8)。另見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ed., *The Nanking Atrocity, 1937-38: Complicating the Picture* (New York: Berghahn, 2007); Feifei Li, Robert Sabella, and David Liu, eds., *Nanking 1937: Memory and Healing*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2); Yang Daqing, "Revisionism and the Nanjing Atrocity",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3, no. 4 (2011): 625-48。張憲文從世界各地的檔案館搜集了相關文獻，編纂了七十二卷本的史料集，參見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有關731部隊的文獻，參見 Sheldon H. Harris, *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 (London: Routledge, 2002); Hal Gold, ed., *Unit 731 Testimony* (Boston: Tuttle, 1996)；侵華日軍關東軍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編：《侵華日軍關東軍七三一細菌部隊》（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5）。

有關慰安婦，參見 George Hicks, *The Comfort Women: Japan's Brutal Regime of Enforced Prostitu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Maki Kimura, *Unfolding the 'Comfort Women' Debates: Modernity, Violence, Women's Voic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eipei Qiu, with Su Zhiliang and Chen Lifei, *Chinese Comfort Women: Testimonies from Imperial Japan's Sex Sla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⑥ 著名例子有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4）；齊邦媛：《巨流河》（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陳方正編：《陳克文日記：1937-195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重要歷史人物的精彩回憶錄。

⑦ 對於概述「日常生活史」的英文著作，參見 David F. Crew, "Alltags-geschichte: A New Social History 'from Below'?",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22, no. 3/4 (1989): 394-407。

⑧ 齊邦媛：《巨流河》。

⑨ 陳克文：《陳克文日記》。

⑩⑪⑫⑬⑭⑮⑯ 齊邦媛：《巨流河》，頁 254-55；254-55；115；183；183；192。

⑰⑱⑲⑳㉑㉒ 《陳克文日記》，上冊，頁 173；173；144-45；145-46；156-57；170。

⑳㉑㉒ Hans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258-63; 282; 282.

㉓ 侯坤宏：〈抗戰時期糧食供求問題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1988）。

㉔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Free China: The Food Situation in Szechuan" (January 1942), UK National Archives, HS 1/148.

㉕ 張立傑：〈抗戰後期國統區的鹽政改制〉，《抗日戰爭研究》，2004年第3期，頁 141-62。

㉖㉗㉘ 蔣廷黻著，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長沙：嶽麓書社，2003），頁 217-25；174-75；223-27。

㉙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頁 479。

㉚ Judd Kinzley, "Assessing the 'Stockpile': The Materiality of Allied Wartime Aid to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ummer Institute on "China in a Global World War II"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3-15 July 2017).

㉛ Micah S. Muscolino, "Refugees, Land Reclamation, and Militarized Landscapes in Wartime China: Huanglongshan, Shaanxi, 1937-45",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9, no. 2 (2010): 453-78.

㉜ Micah S. Muscolino, "Water Conservation Projects in Shaanxi and Gansu",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ummer Institute on "China in a Global World War II"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11 July 2017).

㉝ 陳方正：〈序言〉，載《陳克文日記》，上冊，頁 xv。

㉞ F. J. C. Hearnshaw, *An Outline Sketch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1919), 13, 170.

㉟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㊱㊲ 《陳克文日記》，下冊，頁 852。

㊳ 有人很敏銳地把朱光潛歸類為蘇格拉底式知識份子，參見 Chen Jingling, "The Socratic Tradition in Modern China", in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ed. David Derwei Wa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533-39；另見李澤厚：〈論美感、美和藝術（研究提綱）——兼論朱光潛的唯心主義美學思想〉，《哲學研究》，1956年第5期，頁 52-60。

㊴㊵㊶ 錢穆：〈引論〉，載《國史大綱：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頁 1-34；2；13。

㊷ 有關民國時期歷史論爭的精闢概述，參見 Law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台北：三民書局，2014)。

④① 黃申如、鄭智鴻編：《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卷一(台北：中央研究院，2008)，頁29-31；Li Chi, *Anyang* (Folkestone: Dawson, 1977)；杜正勝：〈新史學與中國考古學——李濟〉，載《新史學之路》，頁174-215。

④② 李萍：〈中國通史寫作的兩次高潮及其原因試析〉，《安徽史學》，2000年第3期，頁93-96。

④③ 何炳棣：〈雷海宗先師專憶〉，載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雷海宗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42-47。

④④ Michael Lang,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History in Toynbe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2, no. 4 (2011): 759-74。湯因比傳記，參見William H. McNeill, *Arnold J. Toynbee: A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④⑤ 參見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London: Simon and Schuster, 1997);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rev. e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London: Penguin, 2012)。關於文明這一歷史研究概念可能捲土重來，參見Krishan Kumar, "The Return of Civilization — and of Arnold Toynbee?"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6, no. 4 (2014): 815-43。

④⑦ John Israel, *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8。

④⑧ 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香港：龍門書店，1968)。

④⑨ 參見何炳棣：〈被忽視的「雷海宗年代」——憶雷海宗師〉，國學網，[www.guoxue.com/master/leihai-zong/leihai-zong.htm](http://www.guoxue.com/master/leihai-zong/leihai-zong.htm); Hans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London: Profile, 2017), 109。

④⑩ 蒲衛東：〈1942-1945年間《群眾》周刊對戰國策派的批判〉(武漢大學碩士論文，2017)。

④⑪ 參見許紀霖：〈從國的境界到自然境界：一個中國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載《啟蒙如何起死回生：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困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197-215；〈緊張而豐富的心靈：林同濟思想研究〉，《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頁100-109。

④⑫ 錢穆：〈書成自記〉，載《國史大綱：修訂本》，頁3。

④⑬ 杜正勝：〈錢穆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載《新史學之路》，頁229-30。

④⑭ Hsiao-tung Fei,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London: Routledge, 1939)。

④⑮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④⑯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編：《抗戰時期的文化與教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頁122-25。

④⑰ Xue Yu, *Buddhism, War, and Nationalism: Chinese Monks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s, 1931-1945*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④⑱ 我的同事周越博士在與我對談時講述了戰時宗教的情況，在此謹致謝忱。

④⑲ Arthur Waldron, "China's New Remembering of World War II: The Case of Zhang Zizhong", *Modern Asian Studies* 30, no. 4 (1996): 953-54。

④⑳ 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51-92。

㉑ 我的學生William Moriarty正在撰寫一篇關於這個题目的博士論文。

方德萬 (Hans van de Ven) 劍橋大學  
中國近代史教授